沈阳三官庙与清初史实

张　玉　兴

沈阳故宫大清门左侧，有一座突起高台紧临大街而自成院落的黄琉璃瓦建筑，这是清朝陪都（盛京）太庙。但这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以后的事情，在此以前，这里并非太庙，而是景佑宫，即三官庙。

三官庙是道教寺院，始建于明代，万历十四年（1586年）曾经重修并竖碑记事。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于天命十年（明朝天启五年，1625年）迁都沈阳后所建的宫殿，正座落于三官庙的东侧，而皇太极继位后扩建的宫殿，恰位于三官庙的西侧。宫殿的附属建筑如奏乐亭、朝房、司房等，则在三官庙之南。这样，三官庙就如同楔入盛京宫阙的一座独特建筑物。而且，在清崇德六年（1641年）皇太极还"饬选道士在庙焚修"，七年（1642年）"给人役园地，道士给衣粮"。而更有意味的事情是，清夺取全国统治权之后，仍然没有忘记对三官庙的特殊关照。顺治九年（1652年），三官庙"奉旨重修"。十四年（1657年）"增道士、置钟磬、立碑"。康熙帝玄烨于康熙十年（1671年）第一次东巡时，驾临三官庙，"赐银一千两，令道士酌量修补"。二十一年（1682年）第二次东巡再次驾临，并特为大殿亲书"昭格"二字扁额，令将三官庙改名为景佑宫。①乾隆帝四次东巡中，曾三次驾临景佑宫，并留有诗作。他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第四次东巡时，又特为大殿亲书"玉虚真宰"②的扁额。同时饬令将景佑宫移建于德盛门（大南门）内路东。移建后的大殿由原来五间扩展为二十间。为"左庙遵古制"③特将原来座落于抚近门（大东门）外的太庙移入景佑宫（三官庙）的旧址，从而结束了三官庙镶嵌在盛京宫殿建筑群中的历史。三官庙获得如此荣耀，在清代东北各寺庙中除嘛喇教的实胜寺（黄寺，俗称皇寺）外，再也没有与之媲美的了。乾隆帝咏景佑宫的诗中有云："天与人归神自佑，春风秋月殿常虚"④，"景佑非今矣，护阿自古然。小其衣锦喻，殊彼迈邦篇。旧里缅先泽，惟怀奕叶传"⑤。一座道教寺院何以引起清朝皇帝如此重视与赞扬？它究竟与清朝统治发生过什么关系，是如何"景佑"、"阿护"清朝的？不能不引起人们注意。

原来在三官庙这小小的院落里，曾经发生过与清朝命运至关重要的两三件大事。

"宫阙崔嵬近大罗，云裾琼佩老仙多。

琅璈奏罢星辰隐，永夜如闻不二歌"。

这是清初被流放到东北的诗僧函可题为《三官庙——张公旧住处》中的诗句，该诗深情地歌咏了住在三官庙中的张春在明清议和之中，代后金(清)向明朝上书，而誓死忠于明朝的感人精神。张春在三官庙的经历实为奇特。而三官庙首先扬名于清史正是从皇太极留养张春开始的。

据《清太宗实录》载：天聪五年（明崇祯四年，1631年）十一月，后金于大凌河（今辽宁锦县）战役中俘获的明监军兵备道张春"不肯剃发"，皇太极于是令其"与白喇嘛同住三官庙"⑥。众所周知，喇嘛是喇嘛教即藏传佛教的僧侣，一般指蒙、藏族僧人。喇嘛教是佛

教的一个宗派。此刻皇太极何以将佛教僧侣派进道教寺院，来与俗人张春陪住？这是皇太极出于同明朝议和的政治需要，而做出的一个精心安排。

皇太极自从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年）八月，继汗位为后金的最高统治者之后，为摆脱困境，开创新的局面，当即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他为集中力量安顿内部、蓄积力量，在对明朝关系上，实行和战两手，积极热烈地推行同明朝和谈政策。和谈，对于明朝来说也是迫于形势的需要。明朝官僚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已认识到和谈的必要，而明朝与后金之间的对峙僵局，首先还是由明朝方面打开的。明宁远巡抚袁崇焕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和在辽东地区多年的经验，提出了战、守、款（即议和）三着并用的方针⑦。他认为“借款以暂息天下，而修我内备”⑧，主张同后金议和。当努尔哈赤病死，他即采取主动，派镏南木坐即李喇嘛等赴沈阳吊唁并祝贺皇太极嗣位。从而打开了明清之间议和的道路。但彼此条件距离很远，因而议和在长时间内一直处于讨价还价之中，但由于双方的政治需要，明清议和又未尝间断。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率军毁边入长城，包围北京。第二年，明朝中计误杀袁崇焕，从此明清间的议和陷于停顿。尽管皇太极不断取得攻明的胜利，但他却并不放松过对明朝的议和攻势。袁崇焕死后，他煞费苦心地寻求同明朝谈判的合适人选。他多次派去嘛喇同明朝联系，还曾通过明锦州总兵祖大寿，以及大同，宣府等明朝地方文武官员，甚至通过朝鲜、蒙古向明廷表达他的和谈意愿。但总的说来，这些中介都不理想。为有效地加强同明朝方面的联系，他需要一位身份恰当而又长期稳定的联系者。天聪五年以后，皇太极确实找到了这样一位最适合的人物，这就是他亲自物色的具有政治眼光、在明廷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张春。

张春，字泰宇，明陕西同州（今陕西大荔县）人。天启进士，累官至永平兵备道，太仆寺少卿。崇祯四年奉命赴辽东至锦州祖大寿军中，为监军兵备道。九月，率军于大凌河前线与后金激战中，兵崩被执。此役明军被俘将领共三十三员，大部被杀，仅留下张春等八人。当被留各官押至皇太极面前时“皆跪拜，独张春不跪”⑨，表示了宁死不屈的态度。皇太极不仅未加杀戮，反而优礼相待，最后命白喇嘛陪住三官庙。白喇嘛在后金国中颇有地位，是介入了后金同明朝关系之中的政治人物，后金曾派他“向明议和”⑩，可见他具有同明朝打交道的丰富经验。皇太极派他进住道院三官庙，显然负有争取张春的使命。令其住在紧临宫禁的三官庙，更是为了联系方便，随时都可以向皇太极奏明情况，而且保密也好。

事实证明，皇太极争取张春的工作成效显著。据《国榷》所载，张春被俘不久，即为后金“上书请款，巡抚邱禾嘉密表其事”⑪。乾隆初年成书的清官修《明史》也记载：“当春未死时，我大清有议和意，春为言之于朝”⑫虽然语焉不详，但张春为皇太极向明朝请和之事则是确定无疑的。《历史档案》一九八二年第二期刊载公布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载《清崇德三年（按即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汉文档案选编》，其中有关明清议和档案四件，包括张春于四月及五月给皇太极的“言”、“直言”两件。为人们了解明清议和，特别是张春在盛京（沈阳）的活动情况，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从这批档案中人们可以得知张春于被俘的第二年，即天聪六年（崇祯五年，1632年）便开始为皇太极与明朝议和建议献策了。从此他一直关心明清议和，并把这项工作做为生存下来的主要寄托。他说，自大凌河被俘以后，所以“苟延八年，止为讲和”，“一息尚存，一隙之明不泯，死不瞑目者此也”⑬。事实正是如此，他被羁留三官庙期间为明清间的议和可谓竭尽了心力。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张春已投降了清朝。张春抗节不屈，忠于明朝是始终一贯的。这在明清间的官私书籍

中都有明确记载。张春被安置三官庙后，仍“着汉服”，“不为剃头”[14]，而且“坐必西向（即面向明朝皇帝所居的京师），每月朔仰天而泣，具衣冠朝拜成礼”。对明朝无限深情。皇太极“屡召，不奉诏”，“但呼部领，不称名”[15]。着实“倨侮傲慢”。张春崇德三年上的两件进言中，也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自称为“难夫”、为“原任督阵监军、兵备道、太仆寺少卿”，这是以明朝臣子自居，不忘明朝。这时，后金改国号为大清、皇太极称帝已经三年，从公布的这组档案看，其他人上奏都一律称皇太极为大清“皇上”，惟独张春若无其事，而是一口一个“金汗”。当明朝事窘，主动遣人向清言和，派出的使者竟是弹曲说书的盲人，够狼狈的了，张春却认为这是“天心厌乱”[16]之举，竭力为明朝张目。他守志不屈，誓不降清，念念不忘明朝，在被羁三官庙期间作《不二歌》以明志。观点、立场是十分鲜明的。具有政治家宽广胸怀的皇太极对此并不介意，反而愈加敬重张春，“设宴之时，每令张春出坐”[17]，对其优礼不减。崇德六年，皇太极又饬选很有文化素养的两位道士：李希与、苗君稷入三官庙陪张春居位，使其不致寂寞。张春死时，皇太极“颇惜之”，并根据其生前要求，“诏礼葬于千山之南，为建石塔表其墓，使后世知有张春”[18]。皇太极如此礼遇张春，却无损于清朝。张春为后金向明朝议和的目的是希望皇太极“正名分、逊辞命、信约誓”[19]，服从明朝。皇太极当然不会就范，相反他却充分利用了张春的积极性完全达到了自己预期的政治目的。可以说，三官庙没有枉留张春一住。

就在张春死后不久的崇德七年（1642年）春，三官庙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即皇太极招降洪承畴。

洪承畴，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累官至陕西三边总督、兵部尚书。他久临战阵、长于谋略，于朝野上下声名甚高。当崇德五年（崇祯十三年，1640年）皇太极发兵攻明，洪承畴奉明廷之命总督蓟辽军务，率八总兵官，十三万大军开赴辽东前线与清对峙。这就是明清间著名的松锦大战。六年八月，洪承畴被困于松山，六个月后城破被俘。皇太极很想将他收为已用，于是在下令诛杀俘获的明朝高级将领时，独留洪承畴，接着执送盛京，被囚拘于德盛门（大南门）内路东的朝鲜北馆，后转移安置三官庙[20]。但洪承畴“感明帝之遇，誓死不屈，日夜蓬头跣足，骂詈不休”。皇太极“命诸文臣劝勉，洪不答一语”[21]。显然，像洪承畴这样身份的人物，不是一般人所能进行劝降的。皇太极决定亲自出面，但又对其能否降清把握不大，于是特派大学士范文程前往试探。范文程一踏进三官庙，见洪承畴正在“科跣谩骂”，便立在一旁不动声色。当洪住口后，即表示慰问，“徐与语，泛及古今事”。正谈论中“梁间尘偶落，著承畴衣，承畴拂去之”。一直在察颜观色的范文程见此情景，马上收拢话题，急忙告辞，归见皇太极说：“承畴必不死，惜其衣，况其身乎？”[22]从微小的动作上洞察了人物的内心世界。皇太极很赞同这种入情入理的推导。于是亲临三官庙探视洪承畴。时盛京地区早春寒峭，皇太极特“解貂裘与之服。徐曰：‘先生得无冷乎？’”洪承畴被这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极高礼遇惊呆了，他“茫然视上久之。叹曰：‘真命世之主也。’”对皇太极佩服得五体投地，叩头请降。皇太极当然更是高兴，“即日赏赍无算，陈百戏以作贺”。对此，很多八旗将领都不理解，以为太过分了，气愤地说：“洪承畴一羁囚，上何待之重也？”回答说：“欲得中原耳”。皇太极听罢大笑道：“譬诸行者，君等皆瞽目，今获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也！”[23]众人皆服。虽然降清后的洪承畴即离开三官庙移居新宅，并且终皇太极之世他也未能受职出仕。但皇太极亲临三官庙招降洪承畴的成功，却是嘉惠子孙的了不起的大事件。二年后，清兵大举入主中原，洪承

畴在定策入关、招抚江南、进军云贵，均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清朝建立了奇勋。因此，就实际意义上说，皇太极在三官庙招降洪承畴，比留住张春，意义更为重大。此事也充分显示出皇太极的宏大气魄与卓识远见。

三官庙还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也足以值得清朝代代统治者加以怀念。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皇太极突然逝世，由于他生前未预定储嗣，陡然间皇位继承成了大问题。以身世、地位、势力看，皇太极长子豪格很有赓继父位的希望，而且拥立者大有人在。但其叔父（即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幼弟）多尔衮觊觎此位，势力又不相上下。彼此互不相让，于是，“相争为乱”㉔的继统危机，便激烈地出现了。

在皇太极死后的第四天，多尔衮“诣三官庙，召索尼议册立”。正黄旗内大臣索尼虽然兼任过多尔衮所主管的吏部启心郎，但他忠于皇室，当即回答：“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这是明确表态，不许立皇太极之子以外的人，等于否定了多尔衮的继位企图。

第二天黎明，皇帝所属的两黄旗大臣在三官庙一壁之隔的大清门，共同誓立皇帝之子。并令两旗巴牙喇兵（护军）全副武装，“张弓挟矢，环立宫殿”，随即到了崇政殿。这时诸王贝勒正齐集在崇政殿议立新君。索尼同巴图鲁鄂拜首先上前“言立皇子”㉕，表达了两黄旗大臣的共同意见，向议立大会施加影响。多尔衮以这是诸王贝勒会议为借口，令其退下，因此索尼等未能与会，但却手执兵器守在一旁。由于诸王彼此意见不同，争论很久，“定策之议未及划一”。两黄旗大臣却按捺不住了，“佩剑而前曰：‘吾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㉖。再次向议立大会施加压力。会议终于“定议奉世祖（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即位”。随后，索尼、谭泰、图赖等六位两黄旗大臣，“盟于三官庙，誓辅幼主”㉗。于是六龄童福临得以稳居皇位，从而开始了福临一系对清朝的统治。可以说，福临即顺治帝即位前后，索尼等人在三官庙的活动至关重要。因此三官庙的“功劳”又在清朝史册上记上了一大笔。福临之子玄烨（康熙帝）、福临之重孙弘历（乾隆帝）之所以对三官庙寄以深情，与此不无原因。

由上可见，三官庙曾与议和、招降、立帝等重大问题紧密相联，而这些均大有功于清朝。康熙帝改三官庙为景佑宫，可谓名实相副。景佑宫碑文云：“盖神既佑民以福国，则国必崇祀以报神”㉘。三官庙的“福国”功劳确非一般，怎能不加以崇祀呢？当然，清朝事业的成功与清帝世系的绵延，决非神佑，而纯属人为。康熙帝极力宣扬神佑，这正如他曾祖努尔哈赤、祖父皇太极尊崇喇嘛、使用喇嘛而并不相信喇嘛教一样，不过是“神道设教”，借神以愚民罢了。

①《盛京通志》卷26。
②《钦定盛京通志》卷97。
③同上书，卷16。
④同上书，卷12，《谒景佑宫》。
⑤同上书，卷14，《景佑宫瞻拜六韵》。
⑥《清太宗实录》卷10。
⑦《崇祯长编》卷11。
⑧《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第3页。
⑨《清太宗实录》卷9。 （下转33页）

潭医院去看望他。那时，他的精神还很好，谈了许多问题，十分关心地询问了南大同志们的近况。最后谈到李秀成的评价问题，他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难道李秀成就这样在历史上被否定了吗？"他当然知道，我在一九六四年和文化大革命中因替李秀成讲过公道话而遭受到无情的批判。可我那时仍"心有余悸"，内心虽赞同校长关于实事求是地评价李秀成的观点，却没有在校长面前表态。谈话以后，我思考很久。从校长那次谈话中，我学到了史学研究中如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立场问题。那次谈话至今记忆犹新！

正由于校长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重视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并亲自参加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这样，在领导高等学校工作中，他取得了发言权。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校长总结出办好高等学校的经验："教学为主，思想先行，后勤保证"。这三句话，到现在仍然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二十年的历史证明，违背了这三条，在高等学校的工作中就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一九五九年五月，校长提出的"坐下来，钻进去"，仍然是鼓励南京大学广大师生员工搞好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有力口号。

回忆往事，至今还感到遗憾的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清史研究室的流产。

大约在一九六〇年，我向校长请示如何把系内主要力量组织起来攻坚问题。校长支持这个想法。我向他汇报了系内教授及中年教师的科学研究方向，提出几种组织起来的方案，一一被校长否定了。最后，我提出主攻清史。那时系内有五位教授研究清朝政治史、思想史以及中外关系史，校藏有关清史的图书亦甚丰。校长支持这个方案，同意在历史系设立清史研究室。这项工作筹建了一段时期，人员逐渐组织起来了，图书资料初步集中起来了。可是，一九六四年大批判以后，工作停顿了。接着我到苏北农村参加"四清"。一九六五年回校以后，主要由于我心灰意懒，"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个研究室流产了。这是我终身引为遗憾的事——校长的愿望没有在南京大学变成现实。直到二十年后，经过教育部批准，在南京大学建立了历史研究所，其中有两个研究室是研究属于清史方面的问题。可是物换星移，人事已非，大好时光已经被耽误了。当年的教授，已有两位作古；当时的中青年，今已垂垂老矣，希望只能寄托于"后生"了。

悼念郭校长，写这些回忆以寄托哀思。

我们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的同志应该以校长的两句诗"出言轻易防空想，遇事艰难怕皱眉"作为座右铭。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虽然智非上等，但一定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出一些成绩以告慰校长在天之灵。

（上接16页）

⑩《清太宗实录》卷5。

⑪谈迁：《国榷》卷91。

⑫《明史》卷291，《张春传》。

⑬⑯⑲见《历史档案》1982年2期，第22－24页。

⑭⑰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9册，第3487页、3478页。

⑮⑱丁澎：《扶荔堂文集》卷9《宁前兵备张公传》。

⑳洪承畴被俘后在盛京的囚所，清官书未见记载。据金梁《光宣小记》说相传是三官庙。

㉑㉓昭梿：《啸亭杂录》卷1，《用洪文襄》。㉒《清史稿》卷237，《洪承畴传》。

㉔《清世祖实录》卷9。㉕㉗《清史稿》卷249，《索尼传》。

㉖《沈阳状启》癸未八月二十六日。㉘《盛京通志》卷32，《盛京景佑宫碑文》。